

中央情報局內幕故事

安德魯·塔利著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中央情报局内幕故事

安德魯·塔利著

周叶謙 郭 健 宋茂春 合譯
伊 偉 張紫墨

(內 部 讀 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3年·北京

Andrew Tully

C I A

THE INSIDE STORY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New York, 1962

根据紐約威廉·莫罗公司 1962 年版譯出

· 內 部 讀 物 ·

中央情报局內幕故事

〔美〕安德魯·塔利著

周叶謙 郭健 宋茂春 伊偉 張紫墨 合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 3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 价 0.98 元

1963 年 4 月第一版 1963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張 8 $\frac{3}{8}$ · 字數 184,000

統一書號 3003 · 663

出版者說明

1962年上半年，美国先后出版了两本論述美国間諜活动的书，一本是《秘密战》，另一本是《中央情报局内幕故事》。这两本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世界許多地方进行罪恶活动接連遭到失敗、特别是美国雇佣軍在古巴吉隆滩遇到慘敗以后出版的，在西方曾引起广泛的注意。《中央情报局内幕故事》的作者安德魯·塔利是美国斯克利浦斯—霍华德系报的老撰稿人，从1948年起到1961年止一直在白宫和中央情报局采訪新聞，是中央情报局的支持者。

书中主要論述从1953年2月艾倫·杜勒斯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到1961年9月被撤換为止，中央情报局在国际上各个重大事件中所进行的活动。作者一方面对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尽量夸大，一方面对其阴谋百般粉飾，同时对杜勒斯的能力则极尽吹噓之能事。同作者的意图相反，书中也部分地暴露了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国所进行的間諜活动和顛复活动，同时对于近年来某些历史事件也提供了一些内幕材料。作者供认，中央情报局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无孔不入的顛复活动，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进行殘酷血腥的鎮压活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供认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在某神程度上已經发展到决定国家政策的地步，这是战后美帝国主义在对外政策上的一个新的重要方面，也是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宪兵和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的又一铁证。

中譯本在部分人名地名后面附加了原文，并酌加了一些
注釋，以便讀者查考。

1963年3月

目 录

一、中央情报局的来龙去脉·····	1
二、中央情报局是怎样工作的？·····	17
三、中央情报局的杜勒斯·····	31
四、多疑的盟友·····	47
五、从危地馬拉到日本·····	62
六、伊拉克之变·····	75
七、伊朗扶王始末·····	91
八、苏伊士之乱·····	103
九、黑夫人·····	115
一〇、克里姆林宫里的内奸·····	137
一一、中央情报局的前纳粹分子·····	149
一二、乐园里的烦恼·····	162
一三、朝鲜战场上的聾子·····	178
一四、“雾谷”手中的蒋介石·····	194
一五、弱者和强者·····	206
一六、空心銀币·····	226
一七、在古巴的惨敗·····	238
一八、现在情况如何？·····	251

一、中央情报局的来龙去脉

1954年夏天一个晴朗的日子，柏林共产党区一家国家鈕扣工厂的經理拿起耳机給西区一家供应商挂了个电话。等那头有人答腔以后，身体肥胖、臉色紅潤的奥托·包尔就一本正經地談起来。

“豪普曼先生，我奉命跟您商談，”奥托·包尔說道，“您要是能再帶点样品来，咱們就可以进一步談那笔买卖了。”

一小时以后，包尔和豪普曼就聚精会神地談开了。包尔还帶着两名助手：一位會計和一位塑料专家，这两个人是豪普曼到来的时候，被包尔叫到办公室里来的。这笔生意談了将近两个钟头，談的尽是關於价格和交貨期限的問題。然而，当豪普曼离开包尔的办公室的时候，他衣袋里却装着一份合同和包尔写的一封介紹合同內容的信，信里写着这笔生意的要点。

当天晚上，豪普曼把这封信帶回家里，鎖上书房門，仔細研究这封写得密密麻麻的信，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一点钟。其实，在夜里十二点钟的时候，他就相信已經找出了他所要找的东西，但他还是花了一个钟头的時間核对了又核对。按說，从这封信上譯出来的密語，对他并无任何意义，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在別的地方也許会有意义。

在这件事情上，所謂別的地方指的就是法国馬賽的一家骯髒的小服装批发店。几天以后，这个批发店的經理就接到了豪普曼的一封信，信中对某些原料提出了优惠的价格。又过

了一个星期，这封信就摆在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倫·魏尔希·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的办公桌上，信上标有“艾·魏·杜亲閱”的字样。这封信向这个机构龐大的美国間諜机关准确地指明柏林近郊一处供东德軍事和民政当局使用的电话綫纜接头的位置。这个綫纜接头可以同时供四百三十二条綫路通話。

奥托·包尔、汉斯·豪普曼和馬赛的那个服装批发商都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他們用的都不是真名实姓，而且都跟鈕扣或服装批发业没有什么关系。包尔这个人特别值得一提，因为他差不多从成年以后就一直是盟国的間諜。远在二十年代中期，他就入了德国籍。当时英国情报机关派他到柏林，并且給他一笔資金开办了一家小工厂。他按照指示，在到达德国以后，有五年多時間沒有跟上級联系。但是，从那以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奥托·包尔不断地給英国人提供情报——报告了魏瑪共和国^①的崩潰，希特勒的上台，对波兰的入侵，德国的战争計劃等等。除了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情报机关以外，誰也不知道他怎么又轉到了美国人手下。不过，这显然是在欧洲胜利日以后不久的事。总而言之，利用身为共产党东德的商业工作人員这一有利地位——这使他具有一种类似政府官員的身份——奥托·包尔源源不断地向华盛顿提供情报已經有十五年以上了。

关于电话綫纜接头的情报，就是源源不断的情报当中很重要的一项，中央情报局立即对它进行工作。搞間諜活动对任何事都不能光凭想当然，首先，光是核对这项情报就花費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最后才证实这项情报是可靠的。所用

① 1919年在德国根据魏瑪宪法建立的资产阶級共和国，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告終。——譯者

的方法說來也很簡單，只不过是叫苏占区的“某人”在“地上挖个洞”。一点不差，那里果然有綫纜接头，靜待人們去利用。

但是，这个机会还不能馬上就利用。即使美国間諜可以到那儿去偷听，在共产党区内却不可能安装对电话进行录音的设备。显然，只有設法从西柏林通到綫纜接头那里去。

在地图上对这个地点作了研究，并派人作了实地調查。这处綫纜接头位于苏占区的阿耳特—格林尼克 (Alt-Glienicke) 村地下五呎深的地方，离美占区边界上的魯多 (Rudow) 村約六百碼。換句話說，这个綫纜接头离美国官方耳目还有六个足球場那么远，真有点令人可望而不可及。不过，無論如何也得想法偷听，因为这不但可以偷听到共产党的軍事电话，而且还能偷听到同莫斯科往来的电话。

1954年末，美国駐德机关在艾倫·杜勒斯的催促下，动手开凿地下坑道。当时也提出过其它方案，但經過討論后都放棄了。要达到那处綫纜接头，除了在地下修一条通路外，别无他途。

中央情报局决不会告訴人开凿这条坑道花了多长时间，因为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件事。但是，似乎在不到四个月的時間內就完成了——这是利用一切現代化设备进行施工才取得的成就。在紧靠边界的魯多村，新建了一个美国空軍雷达站。在雷达站的周圍盖起了几座带崗楼的房屋。然后，就开始挖掘。

临时充当挖坑道的工人从雷达站寬敞而通風的地下室里开始，斜着向下掘进二十呎，在朔恩法耳德 (Schoenefeld) 路的柏油路底下掘出一条地下馬路。朔恩法耳德路連結着魯多村和阿耳特—格林尼克村，并且一直通往苏軍和东德民航机队使用的机場。成千上万吨的泥土从地下先运到雷达站的地下

室里，或者分送到其它房屋，然后装进一些大箱子里用卡车运走，箱子上贴着各式各样使人不起疑心的标签，以免引起出没在四周的共产党特务的注意。

工程平安无事地进行了五个星期。后来有一天，正在朔恩法耳德路地下深处进行挖掘的工人，突然听见头上有动静，这个不祥之兆使他们大吃一惊。上面也有人在挖掘，那绝不会是什么亲美的人，因为这时坑道已经深入到共产党区以内了。坑道里的人慌忙打电话通知设在雷达站里的指挥部。同时，工人们焦急不安，提心吊胆地围在一起，工程中断了。

在地面上，一个电话打给住在西柏林的一个人。这人是个两面特务——他替东德政府“工作”，向他的共产党头子提供假情报，又利用这个身份为盟国盗窃共产党的官方机密。电话就是叫他去调查一下朔恩法耳德路上究竟在挖什么。

这个特务驾车穿过边界，到阿耳特-格林尼克村买了点在美占区买不到的一种香肠，磨蹭了很长时间，喝了两瓶啤酒，在回来的路上跟几个正在道边一条沟里干活的工人粗野逗趣地搭讪了几句。直到天快黑的时候，他才回到美占区，打电话向他的联络人报告说：工人们正在朔恩法耳德路上“换自来水管”。坑道里马上就恢复了工作。

挖掘坑道的工作就中断过这么一次，这在事后回想起来简直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因为美国人以他们特有的那种工作效率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筑成了一条非常漂亮的坑道。这条坑道直径六呎，是用一节节拿螺丝拧在一起的波形铁板连成的，两旁还堆着沙袋。坑道里装有空气调节器，有电泵用来排除渗入的雨水。里面还设有交换台、电流升压器和四百三十二架扩大器，必要时可以同时接到綫纜接头的每一条綫路上。此外还有一套精密的偷听电话用的窃听和录音设备。

包着厚鉛皮的偷听綫，穿过一层木头隔板，通过一条陡直的甬道，又穿过两重铁門，最后接到东德的綫纜接头上。把这些电綫接到共产党的綫路上的时候，連一秒钟都沒有影响通話。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但又非作到不可，不然就会引起共产党当局的怀疑。脉冲通过长距离的电綫，几經曲折，由扩大器把它們升高，然后經過一个分配器通到雷达站。在雷达站里有四百三十二架磁带录音机把共产党的通話記錄下来。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美国当局利用这个坑道偷听东德軍事人員、东德当局和苏联当局之間的通話以及同莫斯科往来的電話。成百万字被录音、譯写、摘录，并仔細加以分类，以便送去核对。华盛顿中央情报局总部有几十个人整月整月地忙着把这些談話加以分析、归类并把它們摘要分送給有关当局。

后来，在1956年4月22日，这个坑道被一小队苏軍通信兵发现了。一个年輕的軍士在进行例行檢修时发现了一条“杂散綫路”，因而就发现了坑道。这位軍士在上面写着“奉司令官命严禁入內”几个俄文字的铁門面前感到迷惑不解。这几个字自然是开凿坑道的美国人写的，目的是使共产党人即便发现了偷听綫也会躊躇不前。

經過一陣慌乱和在電話里爭吵了一通以后，最后才批准了对这个神秘的門进行調查。苏軍破門而入，坑道就暴露了。但是，早在头一个苏联人的手接触到偷听装置的时候，警报就已經响了，坑道里已經空无一人了。

紧接着，苏联就向华盛顿提出照会，要求惩办开凿坑道“从事地下間諜活动”的人員^①。共产党报纸指責这种偷听行

^① 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可參閱1956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新华社25日柏林訊。——譯者

为損害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并且声称:艾倫·杜勒斯的妹妹、国务院德国問題专家埃兰娜·兰辛·杜勒斯女士(Eleanor Lansing Dulles)曾經两次到坑道里“檢查它的工作”。

奇怪的是,苏联和东德的报纸都異口同声地称赞这个工程,把它說成是“勇敢的……大胆的……異想天开的……甚为巧妙的……而且十分艰巨的”。不久,苏联方面就把它当作一个游覽項目而向公众开放,并且有向导讲解复杂的偷听活动。到1956年6月9日才停止开放,据宣称有四万名“东德和苏联的工人代表团”的成員参观了美国間諜工作的这项光輝成就。

共产党游客們看了这项工程以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即使煞費苦心的事在間諜活动中已經司空見慣,柏林間諜坑道也仍然称得起是现代間諜活动中的一个奇迹。不論花多少錢都是值得的,因为它向美国提供了大量秘密情报。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說,它拯救了許多人的生命——多亏了从坑道里偷听到的情报,許多美国雇用的外籍特务改变了活动方式,因而保全了性命。

柏林坑道的成就不論有多么了不起,也只不过是中央情报局历史中很短的一个片断。在它的历史中,另外还有許多光輝的篇章。中央情报局無論在人力、財力或活动条件上都达到了美国制度所容許的限度,因而它的記錄上还会增加新的成就。不过作买卖总有賠錢的时候,对我国說来不幸的是,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并非总是像在柏林坑道上干得那样出色。自从它在1946年成立以来(当时称为中央情报組〔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不論在判断上和行动上都犯过大錯,有时候,这些錯誤严重到足以威胁世界和平。如果我們全面地、

仔細地檢查一下中央情報局的工作，是會發人深思的，因為這會提醒我們：在目前這種緊張時期，像中央情報局這樣一個人多、權大而且有錢的諜報機關，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可以產生巨大的影響。

的確，過去十年來，在一般美國人的腦子裡存在着很大的疑問：中央情報局除了充當外交政策的一個偵察兵或一種工具以外，是否實際上還在制定外交政策？這是因為就連在華盛頓也一直没有搞清楚中央情報局的任務究竟是什麼。隨着時代的演變，隨着世界混亂局勢所造成的機會愈來愈多，中央情報局的任務也就與日俱增。中央情報局之所以掌握並利用了這些機會，主要是因為沒有別的機構插手這樣做。大致說來，中央情報局在世界一定地區是在政策範圍以內進行活動的，但是它的日常活動却是由局長，甚至往往是由當地的負責人自行決定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情報局就往往超越了它的職權範圍。

大多數美國人認為，間諜活動即使不算不道德，至少也是不體面的。我們這個民族還不夠老練，不像英國人那樣對間諜活動持有一種超然態度。英國人同間諜活動打交道已經有好多世紀了，所以他們能把間諜活動當作一件“心照不宣”或不足為外人道的東西而深鎖在密室中。因此，直到近幾個月來中央情報局處於四面楚歌之中時，有些美國人才如夢初醒，開始懷疑：中央情報局究竟是個甚么樣的機構？它是怎樣成立的？尤其是1961年4月在古巴遭到慘敗以後，他們開始懷疑：要老百姓掏腰包納稅來維持中央情報局是不是值得？

高尚也罷，卑鄙也罷，間諜活動幾乎是從有人類起就有的，多少世紀以來它一直是軍事領袖和野心勃勃的統治者手中的一件法寶。根據《聖經》的記載，摩西在打發探子去“窺探

迦南地”^①的时候，就已經認識到間諜活动的价值。中国著名的軍事哲学家孙子也給情报工作以很高的评价。他在公元前六世紀时写道：“故明君賢將，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②十三世紀席卷欧洲的蒙古人曾依靠严密的情报組織搜集了大量的情报。迈克尔·普劳丁(Michael Prawdin)在他所著的《蒙古帝国》一书中提到，蒙古人的情报甚至把欧洲“君主的家庭关系”也包罗无遺。而“欧洲人对蒙古人則一无所知”。当欧洲掙脫中世紀的黑暗之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就曾得力于一位真正第一流的情报专家弗朗西斯·沃耳辛厄姆爵士^③。国务大臣沃耳辛厄姆的座右銘是：“获得情报不惜重金”。他拿很大一笔私財供养了一个間諜网，还有一套复杂的密碼和暗号。

我們不妨簡略地介紹一下中央情报局的成立經過。中央情报局是由于珍珠港事件而設立的。日本人那次突襲，几乎完全摧毀了我們的太平洋舰队。这不仅使普通老百姓大为震惊，也使政府当局受到这样一个教訓：以美国这样强大、富有并且肩負重任的国家，居然还会丧失警惕，让敌人钻了空子，实在太不应该了。經過調查以后，发现曾有許多迹象警告說日本人打算有所行动。从四面八方搜集来的大量情报本应引起太平洋方面陆海軍司令官們的警惕，讓他們察觉我們处在危險之中。但是，軍事情报人員所搜集到的这些情报，大部分被束之高閣，因为那时还没有一个专职的中央組織負責分析这

① 指摩西根据耶和華的指示，派遣十二人窺探迦南的事。見《旧約全書》《民数記》第十三章。——譯者

② 見《孙子》《用間篇第十三》。——譯者

③ 弗朗西斯·沃耳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 1530—1590年)，英国政治家，曾任伊丽莎白一世的国务大臣。——譯者

些情报并迅速地把它们分送给有关当局。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弗兰克林·罗斯福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间谍机关——战略服务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但是，杜鲁门在战后把它撤销了。其所以被撤销，主要是因为杜鲁门周围的那些政府院外活动集团分子不喜欢它。也就是说，它是在三军军事情报组织和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的联邦调查局的要求下垮台的。他们硬说在和平时期战略服务处只不过是一个浪费钱财的重叠机构。

但是，不管战略服务处有什么缺点，它至少总是一个能把情报转送到白宫的中心。在撤销它以后不久，杜鲁门就发现互相矛盾的情报不断涌上他的办公桌，弄得他无所适从，常常大动肝火，而且耳目极为闭塞。结果，有一天早晨他以他的典型口吻宣称马上需要有“把这些东西弄出个眉目来的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

1946年1月22日，杜鲁门更加正式地办了这件事。他坐下来，口授了几封内容相同的信给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陆军部长罗伯特·派特逊(Robert P. Patterson)、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James V. Forrestal)和总统军事顾问威廉·李海(William D. Leahy)海军上将。总统指示这几个人组成国家情报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Authority)来策划、推动并协调“一切联邦对外情报活动”。不久，情报局的这几个成员又从他们所主管的各部门中任命人员，筹拨经费，组成了一个中央情报组来协助他们进行工作。杜鲁门任命悉尼·索尔斯(Sidney W. Souers)海军少将为中心情报组组长，以领导这个组的工作。简单地讲，中央情报组成了国家情报局的执行机构，索尔斯海军少将实际上成了我国第一任的特务首领。

不过，索尔斯海軍少将是在国务卿、陆軍部长和海軍部长的經常監督和指导下埋头进行工作的，尽管这种監督和指导往往很松弛。索尔斯海軍少将不能同部长們平起平坐，而只是一个下級，他的主要任务是对所有情报活动的收获进行核对、摘录，然后呈送总統过目。这显然已經使杜魯門滿意，因为他只要有办法使他耳目灵通就行，但是許多人却并不以此为滿意，他們认为一个中央諜报机关必須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和更大的行动自由。艾倫·杜勒斯就是其中的一个，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在間諜活动上都有过出色的成績。

尽管鼓吹成立这样一个組織的呼声甚囂尘上，中央情报組仍然繼續进行工作，組长更換了几次。1946年6月，陆軍航空部队的霍伊特·范登堡(Hoyt S. Vandenberg)將軍继索尔斯海軍少将出任組长。1947年5月，范登堡又由海軍少将罗斯科·希倫柯特尔(Roscoe H. Hillenkoetter)接替。在希倫柯特尔任內，国会下令統一国防机构，撤銷了中央情报組而代之以現在的中央情报局，这个局应当在国家安全委員會的領導下工作。

关于中央情报局应当是个什么样的机构的問題，在許多人向国会提出的証詞当中，要以艾倫·杜勒斯的意見最为詳尽。他主張，中央情报局应当有权控制自己的人員；局长应当有全权選选自己的助手；該局应当有自己的預算，由国务院和国防部补助經費；該局应当是唯一有权監督一切情报活动、获知一切有关外国情报的机构；該局应当是有权同外国的中央情报机关打交道的“被认可的机构”。艾倫·杜勒斯还主張，应当制定有关“官方机密”的法令，以便在发生泄密情况时，可以保护或懲罰中央情报局的人員。

艾倫·杜勒斯和其他許多人都主張尽可能让一位文职官

員來擔任中央情報局的局長，他反對把中央情報局變成“一個單純是協調三軍軍事情報組織的工作的機構”。他主張中央情報局成為美國的**中央**諜報機關。不過，他也堅持一條重要的限制。他說：為了能有一個同制定政策毫無牽連的機關供其他決策和執行機關驅使起見，中央情報局的職責應當僅限於權衡材料並從中作出結論。他還說：“中央情報局不應同政策發生關係，它只應努力去掌握確凿的事實材料，然後由別人根據這些材料決定政策。”

中央情報局之所以受到責難，或許正是由於艾倫·杜勒斯本人和國會都沒有堅持執行杜勒斯如此認真提出的這條限制。這是因為在1947年所通過的國家安全法中有一段意義十分含糊的話，這段話使專門從事間諜活動的機關大為高興。該法案為中央情報局具體規定了三項任務：就情報活動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供意見；綜合並審查有關國家安全的情報；“為現有各情報機構”提供“共同有關的服務”。

但是，該法案第一零二條的末一句話卻引起了混亂。這一條的最末一句規定：中央情報局得按照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指示，執行“其他職能和任務”。批評中央情報局的人們就根據這句話指責說：國會實際上是把一張空白支票交給了我們的間諜，使他們可以任意推翻外國政府，可以用溫和的或粗暴的方式任意干涉別國的內政。其實，這句話雖然的確賦予我們的間諜以極大的權力，但它並不完全是一張空白支票，因為按照法律規定，中央情報局只有根據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指示才能執行這些“其他職能和任務”，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包括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和民防國防動員署署長。

除此以外，中央情報局從成立那天起，就受到其他一些特